

第一章 总论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君书·更法》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
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
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
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
强。

——《管子·制分》

我们站在世纪之交。

前面，有古人，后面，有来者，旁边，有同志者，也有异志者，自己心中，也常有“两军”相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

回首之际，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神州大地，生我养我之乡，先是战火狼烟，后是“斗”字当头，元气大伤，民贫穷而国不强，到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段时期，我们穷坏了，也醒悟了，面对隔壁邻舍“富的富”，发的发”面对“苏联老大哥”与我们一样爱打爱斗不爱建设而落伍灾变的事实，铁下心搞建设，而且建设绩效实在不错，“小康路近”好生喜人。因此，我们还来不及“念天地之悠悠”，也似乎不必要“独怆然而涕下”。但当此两个千年两个百年之交，我们也确乎需要回思上一个百年的经验教训，为下一个百年国强民富作好充

分的精神筹划。

回思,有各种各样。

在哲学的层面进行回思,常常被庸人(包括一些持有大学乃至研究生文凭但“匠”气十足者)视为“迂腐”、“空泛”,但它如果真正摸准了上一个世纪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脉搏,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扬其精华而弃其褊躁,为来日中国的国强民富提供一个真正够格的精神导向,那么,这种哲学反思就是最深刻的,也是目下中国人的当务之急。确实,被视作以“实践理性”导引行动的国人,在数百年落后的氛围中,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为自己目前和尔后的渐进改革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性支撑,实在是太必要了。“生物学家赫胥黎指出一百种里有九十种以上的生物皆有倾向于‘模式维持’之倾向,其结果是每十二种生物里就有十一种在地球的表面绝种。历史上许多文化的死亡,其可能的原因之一也许即在过分强化传统,认同而减弱了适应、变革之能力”(台湾金耀基先生言。参见罗荣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9页)。

早在 1994 年,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就提出,我们应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回顾总结”,做好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它可以对下世纪起借鉴、引导作用。现在总结正是时候”(《社会科学报》1994年7月7日)。在此之前,八十年代,我国一些留外学生也曾针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的一些深层矛盾,提出导引经济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应首先在哲学层面反思自己,包括从根本上弄清楚公有与私有、市场与计划和生产目的等经济哲学基本问题,才能成为真正促进中国改革的精神力量。在这里,世纪性回眸,已经被聚焦于经济哲学。经济建设是社会的根基,也是眼下中国一切事情的中心;对中国进行世纪性的哲学回眸,以经济哲学为聚焦点,合情合理。而中国改革的实践,也使这一聚焦愈见集中鲜明。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提出和细化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与我

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关结论格格不入；中共十五大在邓小平同志股份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股份制把国有大型企业改造成现代企业的设想等等，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也很难找到充分的理论支撑。显然，问题只能首先放在经济哲学的层面才能获得应有的解决。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发展，世纪之交的历史际遇，已把经济哲学推到了中国进行世纪性回眸的聚焦中心。

改革开放中我国理论界的争鸣论战也时起时伏。为什么一些很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家，面对日益深化的改革实践，往往出于“好心”但却甘当改革的理论“对立面”？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在经济理论领域，人们往往很难取得共识？从理性的深层面看，病根子首先在传统的经济哲学上。中国论界围绕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反复争论，实质也是新旧经济哲学的较量。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哲学的解构和重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的世纪性反思，显然也只能首先在这里展开。

当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大转折时，有识之士总是敏锐地悟到在哲学层面反思以往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必要性；哲学也在这个时段成为开拓新时期的最深沉嘹亮的号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哲学的骄傲，其他学问难以取代。如今，当苏美冷战被尘封为往史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当西方大国也在原子个人主义和纵欲无度的生活模式中气喘吁吁并急呼价值观改革时，这一哲学的“历史节目”同样再一次上演着。西方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在近年出版的书中，便明确提出：前苏联的消亡不等于西方大国的全盘胜利，在西方长期泛滥的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已经严重影响着社会平稳发展，迫使西方国家必须首先从价值观的层面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重建自己新型的信念体系（参见布氏《大失控和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此之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也写道：“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

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10 页)就凸现当代人在哲学(包括价值观)层面反思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的必要性而言,贝尔之言也有相当合理性。当此时代性质巨变和知识经济君临之际,无论对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导向而言,或者对新的经济理论的催生而言,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也许是由于文化特点所致罢,近代和当代西方有水平的经济学家在思考和研究时,大体均从经济哲学开始自己的理性航程。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始发港的而且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以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作为理论互补物的。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王牌经济学家”凯恩斯,虽被看作“经济学贵胄”,但他也承认“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转引自林德贝克《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7 页)。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奥肯也公开表示对哲学的“敬畏”(《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页)。在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更几乎个个都是首先在经济哲学上独树一帜的哲人,很少有全部使用他人经济哲学体系而自己只从事逻辑展述和应用者。其中,1978 年获得诺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不仅在著述中以阐发人们认识的“理性有限”而获巨大声誉,而且前不久还在美国某大学的心理学系工作(参见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1974 年获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完全计划经济模式的摧毁性理论打击,也不是首先在经济学领域展开的,而首先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实施的(参见哈氏《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收于李兴耕等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当代经济学的哲学化已经是越来越强大的学术潮流,难怪我国有位学者甚至以为经济哲学已经是“第四代经济学”

的主体了(参见《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27日所刊《第四代经济学》)

与国外经济学越来越哲学化的趋势相比,我国以前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无视新的哲学思考。一些研究者往往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经济哲学,盲目阐发和复述它。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忽视、淡视乃至贱视哲学者,却大有人在。由于哲学在中国曾经多年被一些人作为政治运动的婢女,所以,一些缺乏应有哲学修养的人们便往往无分析地把所有哲学看成“荒唐”的代名词,根本不愿意涉足哲学;一些不清楚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经济学家,也害怕哲学“插足”经济学会使后者“堕落”,于是他们实际上僵定于过时的经济哲学体系而对当前的改革开放横加责难。我国南方一位年轻学者,在批评关于“哲学从来没有影响过物理学”的片面见解以及某物理学家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先生重视哲学的不以为然时,曾指出:“这一点在我们当前的博士生导师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导师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东华《新大学人》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第92页)此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而言,也不全是空穴来风。仅从重建中国这两门难以缺少的科学而言,突出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也就成为一种学理的必然。

这样,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历史地凸现出了经济哲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迎合着这种实践的 and 理论的大趋势,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均出现了对当代中国经济哲学研究及转轨的深情呼唤,于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终于启动起来了。哲学界有人把经济哲学研究看作当代中国哲学通向现实的一个主渠道,有人认为它是当代中国哲学摆脱抽象主客体模式导致的贫乏状态而走向学术繁荣的一大载体,并推出了自己的成果;经济学界则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带领下,也迅速从经济哲学的层面出发,为

改革开放提供着深层理论支持。形势令人乐观。作为引玉之砖，本书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抛’出的。

第一节 “经济哲学”界说

经济哲学研究的展开，要求人们对其性质和研究对象以及范畴系列等基本问题给出界说。

由于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在我国，目前经济哲学实际上被界说为广义、狭义及介于二者之间者三种。简而言之，广义的经济哲学以“经济观”为研究对象，注目于社会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一般经济理论中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狭义的经济哲学仅仅指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的交叉，它区别于“经济的哲学”只是系统地、严格地对当代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作现代哲学阐释的学科；介于二者之间的经济哲学又分成色彩浓淡配合不同的许多见解（参见 1994 年 8 月 18 日《社会科学报》、1997 年 2 月 15 日《光明日报》等报刊书籍有关讨论文章），在我看来，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各异，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在研究经济哲学时，似可在以上各种界说中任意选择，至少在目前不能强求一律。

狭义界说的缺陷

由于所处文化氛围的关系，学者们易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提起经济哲学，有人便往往易于想到当代学园经济学和当代学园哲学全面而系统的交叉融合，以及它应当有严格的逻辑体系等等。对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许多年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往往太执迷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了，往往没有自己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性结构，往往是一堆政治口号和一堆未被辩证把握的学术概念的混合堆砌物，不时令正直的学者为之扼腕。面

对此种陋习，学者们出于学术良知，高标准要求经济哲学的学术品位无可非议，更何况理想中的作为纯理论体系的经济哲学也应当是辩证综合当代经济学和哲学成果的具有严格逻辑体系及理性结构的学术精品。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本书的主题而言，还是就哲学本质的思考而言，严格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作为主流定义的。

这是因为，它几乎忽略了哲学在人们认识经济现象和从事经济活动时的巨大导向和方法价值，把哲学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广泛联系仅仅局限在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范围内，显然片面。按照这种界定，经济哲学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只能是生活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的理论知识渊博的学者；从事非理论研究工作的人们，其中包括古今中外从事宏观或微观国务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似乎都要被排除在其主体之外，这当然有偏颇。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哲学除了表现为纯粹理论形态以外，更主要的是表现为芸芸众生的“经济观”，即人们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对待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包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如何对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判据看待经济现象，如何把握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等等。在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意义上，古今中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一切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转轨，也包括经济实体经营中的成败，以及理论家对经济客体的观察和思考，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可以肯定地说，凡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之处，都有经济哲学存在。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主要形态而展开的；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作为人的理性之一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导引，亦即都割不断与某种哲学的联系。当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很可能许多并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他们也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到会与什么哲

学发生关联，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哲学无缘；只要这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有自己的好恶和追求，有自己对经济事务的看法和感悟，那么，这种好恶、追求、看法和感悟等等，实际上就不能不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至于一些哲学修养水平不低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企业家和理财能手等等，指导或从事经济活动，经济哲学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也就必然更自觉和突出鲜明。还有，任何一个理论家（不仅包括经济学家，而且包括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任何一个文艺家，在面对经济生活进行理论思考和艺术创作时，也都不能不渗透着自己对有关经济活动的评判、好恶，且以之作为自己思考和创作的出发点，这也就是某种经济哲学的表现。很显然，在一切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只要经济实践主体和经济理论主体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经济哲学就必然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对于经济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表现在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中的经济哲学，才是自己首先应予归纳和注目、提升的对象。当然，表现于经济理论之中的经济哲学，也是需要注目的，但是，就经济理论只是经济实践的某种程度上的表象而言，它们也只是实践中的经济哲学的曲折的不全面的反映而已，对它们的注目毕竟不能代替对后者的归纳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经济哲学界说，远比狭义者更接近经济哲学的真义。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强国富民方面有巨大劳绩或成绩杰出的中外国务活动家们，往往没有留下纯理论形态的哲学或经济学著述，更难有关于经济哲学的纯理论阐述；这些经济哲学大都体现在关于强国富民的言论行动或有关政策举措之中。用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来衡量，他们的经济哲学往往被排除在研究者视野之外。问题在于，当中外某些杰出国务活动家的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于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经济价值观选择的纠偏及重新选择组合）确实导致了可观绩效，但又还

未被包括某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人们所普遍接受而需要大力提取、归纳、宣传、普及之时，仍然以学园模式为唯一范围，把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有鉴于此，本书以下对“经济哲学”一词的使用，一般采其广义。它不仅指当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融合形成的纯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尤其指非纯粹理论形态而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哲学与经济学关系新解

为对经济学家说明经济哲学的重要性，看来，对经济学理论的结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参见库氏《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的第二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库氏的这一公式揭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可以说，任何经济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历史观、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历史观、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只能是某种经济哲学。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经济哲学作为自己出发点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经济哲学。这也就是说，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实都是作为某种经济哲学的逻辑展开而存在的，它根本不能自外于经济哲学，经济哲学的确是它的“始发港”、“精髓”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而言，确实存在着“哲学帝国主义”。也因此，把经济学与哲学看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同一层面的学科，无前提地把经济哲学看成此两者的“交叉学科”显然也有待推敲。在我看来，如果抛开任何经济实践必然内含着某种经济哲学这一问题，仅仅着眼于纯理论层面的经济哲学，那么也可以说，任何经济学都是哲学的；哲学总是经济学的“内生变量”。经济哲学研究的实用功能之一，便在

于汰去经济理论的逻辑推理内容，注目于经济学采用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正误和准确，借以评判一种经济理论的哲学品位，力求形成更好的经济理论。有些经济学为什么不对不好，或者缺漏不小？毛病往往出在其哲学出发点不对头，不准确（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上册第 11 页）。经济理论的错误缺漏往往是其哲学错误缺漏（在当代数学手段强大的条件下，逻辑推理失误较少）。也因此，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由哲学以前曾当过“政治婢女”而至今一般地拒斥哲学，本身就表现着对经济学理论结构的一知半解，不足为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研究经济哲学也是我们经济学家分内的工作”。

广义经济哲学外延界说

仿照一般哲学原理及其架构，以经济生活与经济意识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引伸出经济哲学研究的一系列范畴，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等等，是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探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人们会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对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如何把握？当毛泽东主席主体化的实践论哲学与唯物史观的逻辑沟通尚待进一步厘清（见本书后述）且毛本人曾经批评邓小平“猫论”时，仅仅仿照主体化实践论哲学这样那样地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对立统一关系，抽象地谈论认识论的主体客体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是否完全妥当？无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或者作为价值观，乃至作为方法论，好的经济哲学的逻辑出发点究竟应当是什么？在价值观的层面上，经济哲学能避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吗？等等。十分显然，经济哲学的体系架构，目下尚存许多疑难点，有待人们深入讨论。很可能，经济哲学研究展开的过程。本身就是人们不断完善其体系架构的过程。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更不必谋求“毕其功于一役”。目前，可以先从一些最

迫切的问题开始研究。例如，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哲学的根本指导理论且认定两者有大面积重合（须知，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以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内容的；它首先注目于社会的经济生活，从经济事实出发说明整个社会生活。因此，作为社会哲学，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哲学），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问题。当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内容及其关系，也均可从经济客体和经济主体两个方面分别把握。其方法应遵循唯物辩证法，无论在社会历史观意义上或在价值观意义上，它的逻辑出发点只能是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它又表现为生产力标准理论）。在唯物史观中，这些均是已被反复确认了的基本原则。我国以前的失误不是因为一贯坚持这些原则，恰恰相反，倒是它们有所忽略的恶果。因此，我们今日的经济哲学，不应是改写这些原则，而是在当代理论成果层面上，回皈于这些原则。本书后面将展开论述，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根本意义之一便是拨乱反正，结合我国的经验教训，在当代理性的层面上，回皈于这些原则。目前，我国哲学界把主客体模式绝对化的倾向颇为流行，窃以为不宜把它套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重建。可以在某一层面上研究经济主客体关系，但它不能无视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客体生产力对主体的先在性和决定性（参见本书第二章）（当然，从辩证法看，在另外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生产力也有决定意义。辩证法要避免只说某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范畴系列中，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客体与经济主体等等之外，在我看，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效率与公平也是一对相当重要的概念。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一对范畴一直是被忽略的，但全世界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相当充当地凸现了它们的重要性，应予补入。

既然在国内外经济哲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经济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经济认识论”和“经济辩证法”等术语，其中有的已经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体系，那么，我们也就应当较全面地考虑作为新兴“显学”的经济哲学学科群的分类及各部分的定位。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尽管一般哲学的学科分类可供参考，但是，鉴于人类经济生活与经济现象同其他事物相比的特殊性，看来也不能将它硬套于经济哲学分类。更何况，任何学科群的分类，都是按某种既定标准进行的，其中也包括了分类者对应凸现学科的评价，因而不同的分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假定”提出不同的分类设计。本书的分类，一方面要考虑到经济哲学本身的体系和逻辑，以及哲学和经济学中既有的分类模式；另一方面，也必须参照我们的经验教训，突出我们认为重要的内容，淡化某些我们认为不重要或无迫切意义的内容。

在总体上对经济哲学我看可以提出“经济唯物论”和“经济辩证法”的基本分类。当然这种分类不是重复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将唯物论与辩证法机械割裂的失误，而是把相对集中突出社会唯物论内容的部分与相对集中突出方法论内容的部分相对独立出来（事实上，这两部分也很难截然分开。在理论上的分开只是相对的），便于论述。考虑到历史和逻辑的互补平列地位，在这一层面还可加入“经济哲学史”，其主旨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弥补和佐证“经济唯物论”及“经济辩证法”，其主要内容不仅包括总结人类经济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中引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利我们建立更科学完善的新的经济哲学，而且应当包括以经济生活作为出发点改写充实已有的哲学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几乎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都充盈着哲学家们囿于兴趣局限、知识局限和历史局限等而只陷于主客体玄思的史实（海德格尔对此有成套批判），已有的哲学史著述又往往只是以这种玄思模式看待以往哲学的，在其中，经济生活对哲学的始源性没有了，经济哲

学也被大大淡化甚至被忘记了，剩下的，只是哲学家们离开吃喝住穿在抽象主客体关系中进行所谓认识论玄思成果的堆积组合，虽然其中不无珍贵的东西，它们也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万万不能一概骂倒，但在体系上，离开经济生活决定性和经济哲学的这种哲学史，往往会把人们引入迷宫，未可过分尊崇，必须以改写过的哲学史与之互补。

在经济唯物论部分，还可以分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彼此作用的模式中思考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中，政治经济学被界说为只注目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看来是片面的。真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出发，借鉴注目资源优化配置的当代经济学成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相作用中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在我看，西方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优化出发，大体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中思考经济问题，如再注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主要是其平等追求——经过改造，堪作当代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便是“生产力哲学”，包括关于资源配置优化的哲学，它倾力于在当代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说明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决定性原理，说明生产力标准，说明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以及用生产力标准观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股份制与非股份制、效率与公平、经济与政治等问题得出的结论，等等。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生产力哲学曾被严重淡化；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便是对生产力哲学的凸现、发挥和坚决贯彻到底。因此，无论对于本书主题而言，或者对于真正坚持经济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言，在经济唯物论及其包含的政治经济学中，首先突出强调生产力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唯物论中与政治经济学并列者还应有经济认识论（包括从主客体认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的空想性，以及研究经济主体的“经济人性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等)经济价值论包括商品价值理论、经济伦理学、经济美学。其中，分别注目经济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并在两者的综合中全面把握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是尤需下功夫的一大关键环节；经济美学关于人的“精神家园”但又是一片“处女地”)等等。

在经济辩证法部分，于凸现唯物史观以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辩证关系的同时，目前似应突出研究作为价值选择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包括两者对生产力尺度共同服从条件下的一般关系，效率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领先，凸现公平尺度的条件（例如在哲学层面上研究公平分配、税收、社会保障、公平的财产制度等等）以及作为经济价值选择矛盾状况之体现的“经济悖论”问题（如个体与群体在经济利益目标上的矛盾，主体与客体在经济目的上的差异，经济主客体互为目的中的具体悖立等等）当然结合当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成功实践而研究展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当代中国的辩证法，包括邓小平同志指导中国改革的方法谋略，也毫无疑问是本部分目前应注目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样，我们便可绘出经济哲学学科群关系的初步草图并从外延上界说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	经济唯物论	政治经济学（包括生产力哲学，以及由此逻辑地延伸出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基于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曰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对它的注入及两者的综合）； 经济认识论； 经济价值论（包含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及二者的整合，以及经济伦理学，经济美学）。 经济生活基本矛盾的辩证法（包括邓小平同志指导中国改革的方法谋略）；
	经济辩证法	经济主客体辩证法；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他“经济悖论”。
	经济哲学史	经济哲学本身的发展史； 以经济生活为根基重写传统主客体哲学史。

除了教科书而外，开创时期的中国当代经济哲学研究专著，一般应是就以上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及其某侧面提出高水平的新见解。它们不必要一出手便构造体系，超出人类哲学思维的常规而面面俱到且大而无当地全面阐说以上所有问题。

第二节 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集中精力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内容，是邓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建设的一整套新理论和政策举措，其中包括他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以及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关于以生产力标准为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试行股份制改革

的思想，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根本点的思想，关于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关于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关于千万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民的思想等等。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内容从根本上看也均是围绕迅速发展中国生产力而提出的，其中包括，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和时代主题的论述，也是着眼于给中国生产力大发展提供全球背景分析；他关于实行“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的论述，更是立足于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等等。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主干，是邓小平经济理论。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很重要”；一旦形成新的理论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实践产生巨大的作用（见《求是》杂志1991年第12期）。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那么，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干，邓小平经济理论便是导引中国迅速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富目标的精神奥秘之所在；作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当代中国人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同时也是建立中国当代“发展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更是建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前提；人们要深刻理解并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必须首先掌握其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在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层面，则必须以全面准确掌握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为根本条件。深入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集中表现在这里。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经济建设的根本秘密，也都存在于该民族该国家的文化特征之中，尤其存在

于作为该民族该国家文化核心的哲学精神之中。由此，可以特殊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能够取得辉煌胜利的精神奥秘，也比较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之中。后者是破译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首要精神“密码本”。在世纪之交的大转折中，本书撰写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响应党中央关于在全国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号召，力求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并掌握这个精神“密码本”，力求在最深的精神层面上保证下一世纪的中国继续保持经济腾飞的良好态势，并早日实现发展目标。

我国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经济在走出传统范式之后显得有点茫然，范式转换过程缺乏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蒲勇健《中国经济学的“脱贫”》，《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12月26日）。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从某个角度看，也是中国当代经济哲学解构和重建及其研究宣传迟缓所致；特殊地说，也是未对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全面深入梳理并使之系统化、学理化、普及化的结果。本书想在这方面先开个头，为引“玉”而抛“砖”。砖“如不佳，祈“玉”早成。

邓小平论邓小平经济哲学

在改革开放实施不久时，邓曾引用陈云同志的意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视作实践和理论两者的“根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2页）。照此逻辑，我们当然也可以把邓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邓小平理论的“根底”。实际上，被邓引用的陈，在1987年《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谈话中便说过：“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求是》杂志1990年第8期）。陈的“最要紧的”这四个字与邓的“根底”二字，是彼此互注的，均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当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主要内容之一被广泛